

方志编纂学浅说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0067

山东地方史志

# 方志编纂学浅说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说 明

《方志编纂学浅说》这本小册子，其中的一至六章，原是为山东省地方志研究班编写的讲授提纲，曾在《山东史志通讯》增刊上刊载过。这次重印以前，又作了修改，并增加了第七章的内容。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并得到从事方志编纂和研究的同行们的指导，在此谨致谢意。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水平不高，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 目 录

第一章	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1 )
第二章	方志的性质和作用.....(32)
第三章	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58)
第四章	章学诚与方志学.....(77)
第五章	新方志的编纂.....(92)
第六章	资料的搜集、整理、鉴别与使用..... (112)
第七章	关于新志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126)

# 第一章 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 一 什么是方志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历史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举凡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灾异等等，皆包罗在内。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普及之广，世界各国，无与伦比，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方志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诵训》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孙诒让疏：“注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者，亦训道为说，诏为告也。方志，即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此官则为王说之，告王使博观古事。二官为联事也。志识字同”。外史是周朝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一，掌管王畿以外各诸侯国的典籍，并负责加工整理以提供给诵训官。诵训官负责把外史提供的记载历史与现状的四方之志，给周天子讲说，使其了解天下情况，更好地治理国家。方志，即“四方之志”的简称，是指记载各诸侯国过去和当时情况的典籍，也可谓国别史。

后来，方志之名沿用了下来。晋代左思的《三都赋序》有：“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渠》就圈称和京相璠对滹台子羽冢所在地点的两种不同记述而

说：“未知孰是，因其方志所述，就地缠络焉。”刘宋范曄的《后汉书·西域传论》有：“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唐代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也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显然，方志并非某一书的名字，而是整个按地域记事这一类书的概称。经过长期的发展，其涵义和内容逐渐明确起来，而成为现在所说的方志。

## 二 方志的起源

我国的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

周朝建立后，分封了许多诸侯。为加强统治，诸侯各国重视了解自己辖区内的情况，设立史官，记事记言。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了。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闾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又如《史记·蔣相如传》记载：战国时，秦赵渑池之会，“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后来，秦王被迫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以上记载中的大史、御史等就是齐、秦、赵三个诸侯国的史官。《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史官即记事之官。他们随时记录本国发生的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活动与言论等，并编纂成书。晋《乘》、楚《杻杻》、郑《志》等国别史，都出自史官之手。

周天子也设官掌管各地史籍。《周礼》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杌》”。小史“掌邦国之志”，郑玄注曰：“若《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称《郑书》之属也。”唐代贾公彦解释说：“诸侯国之所有记录之事，皆掌之。”这里，“四方之志”和“邦国之志”可以说是周天子属官所掌管的国别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与封建社会里自《史记》以后的国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文解字》：“国，邦也。”段注：“戈部曰：‘或，邦也’。古或、国共用”。或即域，所以“国”也就是“域”，它不具有代表奴隶主中央政权或封建王朝统治的意义，更与近代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指周天子分封的周朝奴隶制王国内的诸侯国。国别史实际上是周王朝某一地区的史书。孔子周游列国曾见到百二十国宝书（按：即国别史），反映了当时国别史之多和分布地区之广。

后来的方志吸收了国别史记载某一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特点；当然，方志的内容比国别史是全面和丰富多了。

方志还导源于地理书。“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东汉王充解释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地理知识是随着生产斗争的发展，人们对山河等地形情况认识的加深而萌芽和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活动地区的扩大，地理知识日益丰富；随着水陆交通和商品交换的发达，经济上呈现出统一的趋势，政治上大一统的趋势也在酝酿中；同时，由于诸侯之间战争不断，为了知己知彼，不仅要了解本国地理，而且要了解他国地理。在此形势下，便出现了一些总结前人积累起来的地理

知识，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山海经》和《禹贡》。《山海经》包括《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十八篇。学者考定其中十四篇为战国时作品，《海内经》四篇为西汉初年作品。此书主要记述了山川、道里、动物、植物、药物、矿物、部族、古迹、祭祀、巫医、原始风俗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和史地资料。《禹贡》是《尚书》的一篇，作于战国时，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以禹时“任土作贡”为主，故名《禹贡》。此书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按州记述了山川、藪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情况。将以上两书内容和方志相比（方志也都记载山川、土壤、动植物、矿物、民族、交通等）。便可看出《山海经》、《禹贡》等地理书与方志的渊源关系。

后来有不少方志正是效法以上两书编写的。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宋王存《元丰九域志》都模仿《禹贡》，把全国分为若干区域，依次记述。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序》指出：“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元朱思本《九域志·自序》更明确指出“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明人田頊也认为：“《禹贡》，志所由昉”（嘉靖《延平志》序）。

方志的起源与古地图也有密切关系。《周礼·天官·小宰》：“听閭里以版图”，郑玄注：“版，户籍；图，地图也。”又《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玄注：“土地之图，若今（按：指汉代）司空郡国舆地图。”《周礼》之外，《尚书》、《诗



经》、《管子》等书，也都有关于地图的记载。我国地图出现很早。据古籍记载，我国最迟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地图。地图标明了行政区划、山川、土地等情况。但是，那时的地图没有流传下来，到底怎么样，已无法知道了。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地图是汉代的。这就是前几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张古地图，上面画着西汉初期长沙国西南部七八个县，位置正确。始于汉盛于唐的方志种类之一的“图经”，正是由“上地之图”发展来的。正如王以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所写：“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直到现在，地图仍是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优秀的文化形式之一的方志是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的特点，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但是，历来论述方志的起源，往往只强调一个方面。如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以为方志只起源于史，而否定方志与地理书的渊源关系，甚至将方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形式图经，排斥在方志之外。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够全面、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志的起源是上面谈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

### 三 方志的发展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方志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方志起源于上面谈的三个方面，在方志史上，这三个方面既有各自的发展，更有相互融合。由于各自的发展（实际上并非各自孤立发

展，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同其他方面内容的融合），形成了方志的不同形式；由于相互融合，逐渐使三个方面的特点融为一体而成为完备的方志。纵观方志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前期的各种方志，内容不够全面，体例不够完备；而且从内容到体例多数都接近地理书。后来，逐渐增加了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物、艺文等内容，体例也随之渐趋完善。就各个发展阶段来说，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地记，但图经已出现，全国性总志也产生了。隋唐时期，地记已衰，图经大盛，以“志”等为名的方志也开始发展。南宋时，图经被“志”代替，且内容和体例都较完备，标志着方志已趋成熟。元代出现一统志。明代方志兴盛起来，数量多，种类有增加。清代，方志达到鼎盛，种类齐全，数量甚多，方志学也已形成。民国时期，方志衰弱下来。下面，分六个时期将方志发展的基本情况作简要分析。

###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我国方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方志得到初步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郡县制已经巩固，封建朝廷、郡县官吏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需要方志作为参考。从秦朝开始全国形成统一的局面，为全国性总志的编写准备了条件。可以说，方志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而逐渐发展的。第二、由于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和发明，生产事业得到发展，门类增多，科技、文化、军事、测绘、历史等方面进步很大，也推动了方志的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方志的各种主要形式都已露出端倪。汉代大量的郡国地志为全国总志的编纂准备了资料，而《汉书·地理志》和《畿服经》的出现，为后来全国性总志的编纂开了先河，创造了经验。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地

记”，但在后来的唐代曾极繁盛的图经这时期也已出现。那些内容比较全面，特别是以“志”为名的志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代表着方志发展的方向。

### 1、郡国地志和全国性总志

自秦统一全国后，封建统治阶级为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了解各地的经济、贡赋、风俗、民情等，重视绘制地图，编写有关资料。秦代有类似后来方志的图籍。据《史记》载：刘邦的军队打到秦都咸阳后，“（萧）何独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其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得秦图书也”。可惜这些图籍早就亡佚了。汉代有舆地图等。《隋书·经籍志》写道：“武帝时，计书上于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大致“计书”记经济、贡赋等，“地志”记山川、风俗等，都属方志范畴。汉武帝命各地把“计书”和“地志”按时上报，由国家太史府保管。东汉时，在国家档案馆兰台，仍保存着不少郡国计书和地志。焦贛《国史经籍志》写道：“古郡国计书，上于兰台，盖地志之属，往往在焉。”

汉成帝时，刘向将全国行政区划和分野进行了整理。丞相张禹管天下财赋，搜集了许多资料，他命其属官朱赣进行总结，编写出《地理书》。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了兰台收藏的全国各地的“地志”资料，吸收了刘向和朱赣的成果，写成了全国性总志《汉书·地理志》。《隋书·经籍志》载：“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全国性总志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而出现的，《汉书·地理志》反映了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

政府的巩固。此书以西汉的一百零三个郡国所属的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县邑、三十二个道、二百四十一个侯国为纲，分别记述了户口、山川、水泽、水利设施、古今重要的聚落、关塞、名胜古迹及物产等。《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和体例成为以后正史地理志的典范，也给予后世的全国性总志以重大影响。

属于全国总志性质的，还有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晋挚虞的《畿服经》、陈顾野王的《舆地志》、北魏酈颢的《十三州志》等其中，在方志发展史上地位较重要的是《畿服经》。《隋书·经籍志》载：“晋世执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俱悉，凡一百七十卷。”由此看出，《畿服经》的内容和体例与《汉书·地理志》比较起来，向前发展了一步，已具备总志的雏形。

## 2、地记的繁盛

“地记”是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由古地理书脱胎而来，其名多称“记”，大都内容单一。有的记地理，如汉东方朔《十州记》、辛氏《三秦记》等；有的记风俗，如《陈留风俗传》、《诸蕃风土记》、《临海风土记》等；有的专记岁时节令，如南朝梁宗懐的《荆楚岁时记》等；有的记边疆风物，如《南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等；有的记山水，如《庐山记》、《汉水记》等；有的记都邑，如《京师录》、《西京黄图》、《洛阳记》等；有的记寺庙，如《庙记》、《洛阳伽蓝记》等。另外，还有冢墓志、宫殿志、园林志等，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现在山东地区范围内这一时期的地记有《兖州记》、《三齐记》、《三齐略记》、《齐记》、《齐地记》、《齐州记》、《鲁

国都城记》等。南齐人陆澄汇集地记一百六十种，编成《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梁人任昉又在此基础上增收地记八十四种，编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集当时地记之大成。陆澄、任昉两人收集到的汉魏以来的地记即达二百四十四种之多，说明了这一时期地记著作之盛。

### 3、图经的兴起

图经由图发展而来。周代地图的发展，在秦为图籍，在西汉为郡国舆地图，到东汉便出现了图经。“图”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等，“经”是对图所作的文字说明。宋代李宗谔曾说：“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玉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条》）。因为古代绘图技术低下，有些内容单靠图难以表示，必须附加文字说明，涉及图象以外的事物更非文字不可。正如唐人贾耽所说：“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旧唐书·贾耽传》）。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需用文字说明的内容越来越多。这样，作为附加部分的文字说明便逐渐增加，作为主体部分的图的地位逐渐下降，图经遂应运而生。史载，秦代有《秦地图》，《汉书·地理志》曾在两处征引《秦地图》，可见《秦地图》中已有文字说明。汉代，地图得到发展，郡国舆地图等大盛，且文字说明不断增加，于是出现图经。正象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载：“图经之名，起于汉代。诸郡必皆有图经，特无由考耳。”

现在所知汉代最早的图经是《巴郡图经》。此书早佚，但《华阳国志》保存了它的一段文字：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三月，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城或三四

百，或幾千里。”这段文字记述了巴郡的建置、疆域、户口等，从中可窥见《巴郡图经》的一斑，但其全貌如何，已不得而知了。

南北朝时，图经渐盛，有《广陵郡图经》、《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荆州图经》等。

#### 4、记人的方志

以上几类方志都是记地的，此外也有记人的，《隋书·经籍志》载：汉光武帝刘秀为表彰他的家乡南阳，下令编撰《南阳风俗传》。这是官修地方志书的开端。东汉地方经济发展，地方豪族势力很大。在皇帝倡导下，各地纷纷编写记载当地人物的志书。“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地方人物传有汉代圈称的《陈留耆旧传》、魏时周斐的《汝南先贤传》、陈寿的《益都耆旧传》、虞预的《会稽典录》等。山东的这类书有《青州先贤传》、《鲁国先贤赞》、《鲁国先贤传》、《济北先贤传》、《兖州山阳先贤赞》、《山阳先贤传》等。

这一时期记人物的志书还有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此书十三卷，今存十卷。记吴国自太伯至夫差，越国自无余至句践期间的史事。因作者是越人，又去古未远，所以在书中收入了不少民间传说，补充了正史记载的缺漏。

#### 5、内容较全面的方志

此类方志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融合了部分地理书的内容发展而成。这一时期各种形式的方志中，只有这类方志距地理书较远，而距史书较近。由于它具有地方史的性质，所以有人将其排斥在方志之外，但从方志发展史来看，这类方志还应该说是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这类方志主要

有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

《越绝书》二十五卷，现存十五卷，记吴越二国史地，上自吴太伯，下至汉代，反映了现在的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建设、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等。所载吴王夫差、越王句践及伍子胥、范蠡、文种、计倪等的事迹甚详。此书内容兼记人物、地理和郡邑等，其体例已粗具方志的规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清代洪亮吉认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澄城县志·序》）。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纪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昉于此”（《中国方志学通论》）。朱上嘉也认为“这部书已具有地方志的雏形”（《文献》1979年第1辑《中国地方志浅说》）。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等十二志和《三州士女目录》。记载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间巴蜀史事。由于作者是蜀地江源人，对蜀事见闻亲切，所以此书记述巴蜀地理、风俗、史迹、人物和少数民族情况甚详，后世四川、云南编修方志，必“据以为典则”（《华阳国志》廖寅序）。就方志而论，《华阳国志》内容和体例都较完备，反映了当时方志发展的水平。它是最早的四川省通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方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方志直接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发展而来。二者的关系甚为明显：郡国地志、地记、全国性总志，是由地理书发展而来；图经是由地图发展而来；内容较全面的志书是由国别史

发展而来，但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包含着相互渗透和融合。正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最后导致了集三家特点为一体的完备方志的出现。

##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方志的发展。汉代兴起的图经成为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内容和体例都趋于完善；以“志”、“记”等为名的方志也得到初步发展。实际上，二者的内容和体例并无多大差别。这一时期方志的体例有创新，政治、经济、艺术等内容的增加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无论内容或体例，仍明显反映出受地理书的影响，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方志虽有很大进步，但仍是不完备不成熟的。

### 1、皇帝下诏修志

隋唐最高统治者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下诏纂修方志。《隋书·经籍志》载：“隋（炀帝）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后改为五年，如有山河改移等情况，则要随时报送（《唐会要》卷五十九职方员外郎）。定期编修志书成为经常的制度，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编修方志。由于政府出面组织，于是出现了一批官修志书。

### 2、图经是隋唐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

兴起于汉代的图经至隋唐繁盛起来，成为方志的主要形式。此时期的图经遍及全国，数量甚多，既有只记一地的，也有综记全国的；体例和内容都有发展。

地区性图经，隋代有《陈州图经》、《固安图经》、《随州图经》等；唐代有《京西京北图经》、《夷陵图经》、



《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润州图经》等。现存最早的图经是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等。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有这两种图经的残卷影印本。《沙州图经》编于唐开元年间，首尾残缺，图也不见了；《西州图经》编于唐乾元年间，仅存几十行。这些残卷图经的主要内容有行政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歌谣、古迹、怪异等；主要的仍是地理方面，但较前有创新，最重要的是记载了歌谣，开了方志记载艺文的先例。所记通西域的十九个驿站及一些水渠、泊泽池堰等，不见于他书，有重要史料价值（罗振玉《沙州志残卷》跋）。边疆的图经都达到了这种程度，内地图经的发展就更可想而知了。

各地图经的大量出现，为编纂全国性图经奠定了基础。全国性图经主要有隋代虞世基等人的《区域图志》、郎蔚之的《诸州图经集》和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等。

《区域图志》的编纂情况，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六载：隋炀帝大业五年，敕内史舍人豆卢威、起居舍人崔祖潜等，撰《区域图志》五百余卷。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又敕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由内史侍郎虞世基总裁，编成图志八百卷。帝因郡秩太少，更遣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其书唐时已大部散失，《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是指当时的残缺本。这是我国官修的第一部总志。官修志书，集中资料和人力，分工合作，成书较快，有利于方志的发展。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四卷，目录二卷，今存三十四